



培养造就打赢未来战争的军事人才

□康耀武 康凯华



10多年的大力推进和发展，人才素质和层次逐步提升，规模效应逐步体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总体上看，由于起步晚、基础弱，与形势任务的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发达国家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状况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足。应坚持院校培训、岗位锻炼与遂行军事行动任务相结合，有针对性地谋战略、练指挥、练战法，努力提高谋划战争和驾驭战略全局的能力。

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强军胜战，要在得人。军事人才的成长要靠培养打基础、靠实践去历练。长期以来，我军探索形成了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现代军事人才培养基本模式，为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军队院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军队院校是军事人才培养的摇篮，依靠军队院校培养军事人才，是世界军事人才建设的一条普遍规律。当前，新的军队院校组织体制已经形成，院校教育应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落实院校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使新体制效能充分发挥出来，加快建设一流军事院校、培养一流军事人才。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的办校治学思路，院校教育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与军事斗争准备靠得更紧，与部队创新实践联得更深，与世界军事前沿贴得更近，更加有效地助力强军实践。

充分重视部队训练实践的基本平台。古往今来，人才特别是军事人才大都是从基层开始，经过艰苦的环境锻炼和实践考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坚持把部队训练实践作为官兵成长成才的基本平台，为那些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崇高价值追求、富有发展潜力 的干部提供实践舞台，鼓励引导官兵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通过多领域、多层次、多岗位锻炼，使他们在部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尽快成长起来。

强化军事职业教育的塑造功能。军事职业教育是院校教育、部队训练的拓展和补充，是素质教育在军事领域的重要实现形式。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根据岗位需求和实战要求，加强军事职业教育成为现代军事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院校岗位任职培训，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启动远程教育，建立军事“慕课”培训机制，使全员学习、开放学习、终身学习成为提高军事人才培养效率的重要方式。

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

近年来，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在解决军队人力资源使用效益不高、吸引保留人才难、军人退役安置难等方面，军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加强军事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入，我军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总部体制改革为军委多部门制后，军委政治工作部主要履行全军党的建设、组织工作、政治教育和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等职能，从体制上解决了干部部门管干部、军务部门管士兵的分散式管理体制，我军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制度的变革。加强军事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应完善人力资源分类，整合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努力使军事人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建立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政策制度体系。军官职业化制度是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重点。通过政策制度体系化设计改革，对各类人才在哪个大的专业领域发展，最高到什么级别，什么时候该入校培训、交流换岗，什么情况下该退役等，都需以法规形式予以明确，确保用清晰透明的职业前景激发军人个体成长和自我管理的内在动力。着眼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实行军衔、服役年限、岗位、工作地域等要素参与分配，根据不同阶段军官能力积累需要和使用价值，建立薪酬评估增长机制，实现人才培养使用效能最大化。

在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上取得突破。一流的军队需要有一流的军事职业政策制度作保障。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化军官职业化制度、文职人员制度、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此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资福利等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通过提升军事职业比较优势，健全有利于官兵成长成才、安心敬业的职业发展机制，推动军人和军属身份地位、权益保障、国家优待抚恤安置立法等，进一步完善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待遇保障和军人荣誉制度体系。

90年前，宁都起义告诉我们

□肖斐杰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这场彪炳史册的伟大壮举，留下了“铁心向党、坚持真理、爱国爱民、敢于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在照片上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为抗日反蒋秘密策划起义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收编冯玉祥西北军之第5路军为第26路军。1931年春，第26路军由山东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7月又参加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被留在宁都防守。此间，党组织派王超等到第26路军，与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刘振亚等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高涨，多为北方人的第26路军提出回北方抗日的要求，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加深了该部官兵同蒋介石的矛盾。中共特别支部对此因势利导，发展参谋长赵博生为共产党员，同时进行准备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上旬，中共特别支部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军中共党员的情报后，随即与赵博生商定举行起义。12月14日，第26路军约1.7万人，在赵博生等率领下胜利举行起义，将部队改编为红军第5军团，下辖3个军。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不朽功勋

宁都起义有力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在革命史上写下伟大光荣的一页。

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大肆镇压革命。宁都起义的胜利，促进了国民党反动营垒的破裂，其内部先后爆发了福建事变、西安事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



从历次反“围剿”到西征，从西北战场到三八线南，从中队政委到军区政委，李志民上将纵横万里，驰骋疆场60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文韬武略，所编著《革命熔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等是军队政治工作与党史研究的宝贵财富。而擅打政治仗更是他驰名军中的华美篇章。

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志民1906年7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在家乡开展武装斗争，后调入工农红军第5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6年5月，李志民调任红81师政治部主任。8月底，部队接到野战军指挥部命令，进攻由国民党军马鸿宾部第35师骑兵团驻守的李旺堡。师领导分析地势及敌我情况后一致认为，李旺堡只宜智取，不宜强攻。作战会议上，李志民分析马鸿宾部虽听命于蒋介石，但倾向于抗日，且对我军心有余悸，加之困守孤城，惶恐不安，继而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化敌为友，争取和平占领李旺堡。经师党委同意后，李志民召集第242、243团政委和师部宣传队，要求他们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对敌展开政治攻势。

在李志民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齐动手，把抗日传单系在风筝尾巴上和孔明灯下，抗日传单便如雪花般飘落城内，使李旺堡守军随手可得，以便其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团结抗日的立场。夜里宣传队向城内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十三四岁的“红小鬼”们还唱起抗日歌谣。突然，城墙上传下话来：“狗来了”，紧接着两声枪响。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非嫡系部队都安插有“蓝衣社”特务监视。待特务走后，城墙上又传来：“狗跑了，继续唱吧！”经过数日宣传，李志民

迅速壮大了红军力量，巩固、发展、保卫了中央苏区。起义部队经过政治教育和精心整编，迅速成长为党领导下的雄师铁军，使得中央红军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多人。红5军团参加了随后中央苏区的历次战斗，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著称。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5军团和红1、3军团紧密配合，取得了黄陂、草台冈战斗的胜利，为中央苏区达到鼎盛奠定了军事基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5军团参加了洵口战役、黎川北阻击战、广昌保卫战、建宁保卫战，顽强地阻击敌人，为中国革命立下了赫赫战功。

积累了宝贵的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经验。大革命失败后，刘振亚等中共地下党员坚持秘密活动，有计划地发展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在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发展了包括赵博生在内的一批党员，最终以26名党员撬动1.7万人胜利起义，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表现出极其高超的兵运谋略和斗争艺术，为我党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

增强了苏区军民革命必胜的信心。宁都起义是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前三次“围剿”惨遭失败，准备投入更多重兵、进行更加疯狂的第四次“围剿”之际发生的。中央苏区被敌人重重包围，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军整支部队阵前起义，极大坚定了苏区军民沿正确革命道路走下去的决心。

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宁都起义已经过去了90年，其伟大精神的光芒始终闪耀，历久弥新。

铁心向党的坚定信仰。铁心向党是宁都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是宁都起义宝贵精神财富的深层内核。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赵博生、董振堂等将领，看穿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与虚伪，坚定走上革命道路。起义胜利后，他们担任军团领导，每次战斗亲临前线，直至喋血黄狮渡、捐躯高台城。赵博生、董振堂向党表示，“共产党叫我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他们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充分展现了铁心跟党走的

上将李志民与他的政治仗

□孙 炜

感到条件已成熟，便向李旺堡守军写了“公开信”。信的大意是：“兄弟阾于墙，外御其侮”，盼与贵军共同抗日，现请贵军退出李旺堡，返回驻地，我军将保证贵军安全并热烈欢送。李志民将信交由破坏科科长袁林，并嘱咐其带上几只肥羊做礼物。当日，李旺堡守军便取走“公开信”，牵走肥羊，翌日便派代表谈判，表示同意撤离李旺堡。

马鸿宾部骑兵团准备撤走的那天清晨，李志民一方面派出部分部队徒手列队等候骑兵团，同时命各连司号员集中待命。另一方面为防有变，李志民早已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当骑兵团一出城，我军部队便吹起庄重、友好的礼号，以示欢送。如此，红81师不费一兵一卒便进入李旺堡，创造了红军以政治攻势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

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1936年12月，李志民所在红81师奉命于李旺堡附近阻击东北军王以哲部第129师，以迟滞其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进攻。

根据党中央关于“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指示，红81师一方面组织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另一方面，由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李志民重点负责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在李志民的发动下，各指战员抄写抗日标语、抗日歌曲，张贴、分发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等传单，让东北军置身于抗日的氛围中，造成一种红军与东北军团结抗日的热烈气氛。12月6日，东北军第129师的先头部队靠近我师阵地。双方均十分谨慎，东北军先打数枪后再缓慢行进，李志民见状即刻命战士对空打枪并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待东北军退走后，我军发现东北军枪打得不少，但我军却无一伤亡。当晚，李志民便派宣传队在东北军阵地附近动情地唱起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万籁俱寂，悲壮的歌声在东北军阵地上空回荡。

翌日，东北军枪声减少，并假装冲到我军阵前。李志民见状立刻命战士喊话：“东北军兄弟们！东北三千万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中，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见东北军匍匐在我军阵地前听我军战士喊话，李志民趁机让战士邀请东北军来我军做客。夜晚，东北

坚定信仰。叶剑英称赞赵博生“赤帜高擎”；毛泽东称赞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坚持真理的毕生追求。坚持真理是宁都起义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是宁都起义宝贵精神财富的灵物品格。在革命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情况下，第26路军的一批进步官兵，没有停止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地下党员坚持秘密活动，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谨慎稳妥发展党员，并没有因为党组织关系中断而停止工作；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身居高位却坚持真理、心向光明，明知前路艰险却一往无前，在白色恐怖时期毅然率部起义。起义后的历次战斗中，无论战场形势多么险恶，军团各级指挥员均心怀革命必胜信念，为了真理和理想，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先后有赵博生、董振堂等一大批将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曲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英雄壮歌。

爱国爱民的炽热情怀。爱国爱民是宁都起义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是宁都起义宝贵精神财富的本质特征。第26路军官兵到了江西，耳闻目睹的都是红军爱护老百姓的事迹，这与国民党对外卖国、对内压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士发出了“回北方，打日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而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兵打仗”的强烈呐喊。在长征路上，为了一个分娩难产的女红军战士，红5军团阻击敌人几个小时，付出巨大牺牲，“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无不体现着追求民族解放、实现民族自强的坚定信念和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崇高品质。

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是宁都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宁都起义宝贵精神财富的要义精髓。从宁都起义的胜利，到铁流后卫的诞生，无不表现出起义部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来江西之前，第26路军中保存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只有刘振亚一个人，他在敌人的虎口中建立了特别支部。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特别支部成功策动了整个部队起义，创造了兵运史上的奇迹。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团，在一次次逆境中完成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水口战斗中，红5军团战士用大刀肉搏，顶住了优势敌军的猛烈反扑；长征途中的金沙江阻击战，红5军团像一“铁闸”拦住10多万国民党军“追剿”军，打出了“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的美名。

（作者系江西省宁都县委书记）

军来了20多人，其中还有校级军官。大家坐在一起聊到东北老家，聊到家中还剩何人，东北军官兵情到深处，不禁伤心落泪。老乡问东北军：“红军专打鬼子，你们咋打红军？”东北军官兵立马解释：不是我们要打，是蒋介石逼着我们打的……通过这样无拘无束的交谈，李志民带领士兵和群众把政治工作做到了东北军官兵心窝里。就这样，红81师同东北军129师夜晚谈心，白天“打仗”，“激战”五六日，双方无一人伤亡。12月13日清晨，我军发现东北军129师已全部撤离。用李志民自己的话说：“这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搞而遣回，瓦解美军

1951年2月，李志民参加抗美援朝，担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俘问题是战争双方谈判阶段耗时许久的难题之一。1951年12月，临近圣诞节时，李志民考虑到美军远赴重洋到朝鲜战场充当炮灰又被俘，便打算利用思乡之情助长美军的厌战情绪。于是，在他的亲自部署下，第19兵团对美军战俘展开圣诞节政治攻势。各军借由布置圣诞树、赠送贺卡、礼物袋、糕点和广播等形式向美军战俘进一步宣传中国和朝鲜两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传达停战谈判的情况，告知他们如果不是美方毫无谈判诚意，战争早就结束了，大家都可回国与亲人团聚，等等。据统计，1951年圣诞节期间，第19兵团的63军送出圣诞树5棵、礼品袋153个、圣诞宣传品50余万份。美军战俘收到礼物后，有的直接将和平鸽纪念章别在帽檐上以示友好；有的直接骂杜鲁门害他们回不了家。时任英国陆军大臣赫德曾公开表示：“从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战俘）给亲戚的六千多封信里，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好的。”

1952年圣诞节前，已调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志民布置对敌政治攻势。他指挥我军通过广播，同敌人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举行火线联欢，让敌人从内心感受到志愿军人道主义的坚持以及对和平的向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尽管敌军司令严令禁止，但仍有敌军士兵与志愿军在前阵地进行联欢，并表示“今后不再与中国人敌对”。

1955年，李志民被授予上将军衔。1987年，李志民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